

1301

杭州文史资料

23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杭州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1999年12月

杭州文史资料(第23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印刷:浙江省农科院科技印刷厂
装订:杭州体东装订厂
开本:850×1168/32
印张:6.5
字数:160千字
印数:1—2000册
版次:199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浙内图准字(99)第214号

目 录

三进梅花碑老衙门见闻	沈松林(1)
回忆杭州沦陷前后	沈国英(6)
抗战胜利后返杭见闻	沈松林(16)
招待美国空军战斗员	乔殿祥(22)
我所看到的许长水部队	钟永水(24)
关于在杭州高级中学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回忆	陈 纲(28)
投枪掷向反动派 ——解放前参与编印《大江》、《批判》的一段经历	朱锡三(35)
我与《当代晚报》	张白怀(40)
原《东南日报》社员工迎接解放斗争纪实	张白怀(55)
解放初期浙报采访生活漫忆	张白怀(66)
杭州解放初期的“教协”和学校接管工作	李益中(70)

解放初期杭州市超龄儿童的教育

——记杭州市下城区超龄儿童速成小学 杨敦仁(74)

建国初期西湖疏浚工程纪实 吴子刚(78)

杭州女学堂的递嬗 钟韵玉(84)

杭州报刊小史 章达庵(86)

杭州早期的洗染业 章达庵(93)

杭州活佛照相馆 章达庵(98)

杭州闹市的变迁..... 章达庵(102)

萃隆袜厂..... 张 梁(105)

金溶仲与振新绸厂..... 章达庵(109)

记杭州嵊县同乡会馆..... 黄品璇(112)

解放前杭州国药店杂忆..... 袁止白(115)

记同盟会杭州支部长张同伯..... 钟韵玉(118)

回忆马叙伦先生..... 沈幼征(120)

一代名医何公旦先生..... 陆景涛(126)

张爱萍将军两次到花坞果园参观视察..... 汪敬羞(129)

斯人已逝 风范长存

——怀念顾春林同志..... 李士俊(132)

宽以待人 严以律己

——记陈伟达同志的一件事..... 顾春林 李士俊(144)

灵隐巨赞法师参加新政协前后..... 冷 晓(146)

德艺双馨忆趣翁

——怀念著名国画家潘韵教授…………… 朱馥生(149)

耄耋犹青春 报国心益坚

——记著名园林专家周永年…………… 刘大培(161)

沈沛霖教授建国后的生活历程…………… 沈建中(167)

蒋介石“还愿”天目山…………… 杨一平(177)

回回先贤卜哈提亚氏墓园变迁始末…………… 张文辉(182)

寻找于谦后裔…………… 项文惠(189)

说风雨茅庐…………… 郁嘉玲(194)

普天同庆彩蝶飞

——为澳门回归制作民族服装的侨眷潘氏伉俪

…………… 牟琴 子系(197)

后记…………… 编者(198)

三进梅花碑老衙门见闻

沈松林

杭州清泰街南边的城头巷与佑圣观巷之间,有个老衙门,根据它后面街名叫“官驿后”,那个老衙门可能是南宋的“驿站”所在地。至于“佑圣观”,更显然是宋代信奉道教的遗迹。笔者在 60 年前,即“北伐”后,曾看到佑圣观路南端路旁,竖立着刻有梅花和诗句的石碑^①,以及佑圣观里一个老道士带着二三十个年轻的女道士即所谓“道姑”,敲打乐器,高声歌唱的情景。至于那个曾经沧桑的老衙门里面有楼台亭阁,东边有个水门,据说是在孙传芳占据东南几省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暗藏军械之处,他后来与“北伐军”拉上关系,被在九江前线的孙传芳发觉了,将他杀死。这些事是笔者进梅花碑老衙门后所听到的故事。

1929 年冬,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傑(号静江)向南京中央大学(笔者母校)要一个能搞经济统计的毕业生,当时笔者已在故乡江苏盐城县当县立职业中学校长,杭州是笔者读中学、大学时一再旅游之处,对美丽的西湖山水有深刻印象,所以当母校征询笔者可否赴浙工作时,我就欣然来杭,不料竟从此滞留浙江近 60 年了!本文仅忆述三进梅花碑老衙门的琐事。

^① 编者注:九十年代初上城区文化馆拟修复梅石园,曾寻找此碑,惜久未找到。后派人去北京找来了该碑的拓片。碑上的梅花是据明朝著名画家兰瑛所作刻成。诗亦很清新,现已按拓片原样制成新碑放在佑圣观巷梅石园内。

(一)第一次在梅花碑呆了七年

1929年冬,笔者来到杭州,即赴六公园附近的“来音小筑”(直到1987年夏季才拆掉),见到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张人傑。他是坐在椅子上抬到会客室的。他问笔者:“你是中央大学张校长乃荪介绍来的吧?”笔者答“是的。”他说:“你去见浙江省设计会李会长石曾,由他安排工作,要好好地干。”说毕即坐在椅子上被人抬起,塞进汽车,开往梅花碑省政府了。后来,笔者就在“旗下”的浙江省设计会里当经济统计员。

1930年春季,举办浙江省第三届县长考试。笔者报名投考,被录取后进民政厅实习,当时的民政厅厅长是朱家骅。不久浙江省政府改组,张难先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辛亥革命前因反清坐过三年牢。他对考取的县长们讲话时,曾说“-县之长是‘父母官’,过去要‘进士’出身,经过多年磨练,才外放当知县。”这几句话显然是说给年轻的考取人员听的。他生活朴素,与女儿住在九曲巷民房里,规定星期天不准坐公家汽车出游,每月伙食费规定限额。常邀随来的高级职员聚餐,但实际上那些人生活是否照他的指示安排,却很难讲了。有一次,他对考取的县长们讲话说:“我到浙江来力图改变社会奢侈风气,民间有何评论,你们可直述。”有一个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考取县长的说:“主席来浙后,社会上已出现了朴素风气。”他笑笑,那个人接着说:“可是旧衣服比新做的贵了!”他似乎莫名其妙,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主席常穿旧马褂,大家仿效,以致旧衣店的旧马褂比新做的贵得多!”他听了似乎发火了,把台子一拍:“岂有此理,我这马褂从辛亥革命前坐清朝的牢房到现在了,那些故意模仿我的人是无耻的……。”他立起走开了,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多年后还有老年人作为笑谈。张难先当浙江省主席只有一年,后回湖北故乡沔阳县,传说当过县政府秘书,解放后据说他曾在武汉大学讲学。

在梅花碑省政府接任张难先为省主席的是鲁滌平。他经常在莫干山养病,只有在蒋介石来杭时,才勉强下山。传说有一次他流泪对蒋介石说自己久病,活不长了!蒋介石安慰他“好好养病”,并批500元给他,对这种传说,人们估计可能与他在梅花碑省主席办公室里活捉曾在山东烟台一带称王称霸的师长刘珍年有关。鲁滌平长期住在莫干山养病,一切政务全由他侄儿鲁岱以省政府秘书长名义料理。鲁岱行动荒唐,特别是每天乘汽车去接“虹月楼”茶馆年轻女茶房,招摇过市的事,迄今还有老年人当着野史谈。鲁滌平死后,他有一妾沙氏住在佑圣观巷。有一天听说沙氏跳楼自杀,笔者随着不少人去看时,已有大幅布盖在尸体上。对这件事,此后有不同的说法,流传很久。

鲁滌平带来的民政厅长叫吕苾筹,他每天下午在大家快下班时,来到梅花碑。早已有他的湖南同乡准备好一壶酒,一盘辣味放在他办公桌上,一切公文由一个姓冯的“绍兴师爷”处理。鲁滌平至浙三年,民间留下的印象有个民谣,即“省主席病了三年,秘书长嫖了三年,民政厅长醉了三年,公家穷了三年!”

黄绍竑第一次来梅花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传说他对蒋介石说:“浙江省财政早已山穷水尽……”蒋介石说:“镇海徐青甫懂得理财,你可问问他。”黄绍竑就提名徐青甫当财政厅长,后来又调任民政厅长。有一次,南京内政部召开会议时,他要准备一个“积谷备荒”的提案,当时民政厅里有个不出面的秘书李立民(因为系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桂系人物)要笔者起草后,由徐青甫带到南京,竟被通过并令各省仿行。徐青甫很高兴地返回杭州,查出出此提案是笔者起草的,于是从此他时常找笔者谈谈,开始了多年的断断续续的接触。抗战胜利,笔者返杭在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创编《浙江经济》月刊时,仍受到他的垂青。

黄绍竑在梅花碑时常请“大人物”去对职员们讲话。有一次蒋

介石带着大“闻人”张啸林去。在黄绍竑提到“蒋委员长”时，坐在大礼堂里的笕桥航空学校学员们突然全部立正。黄绍竑莫名其妙，连忙说：“请坐下。”他再提到“委员长”，那些学员又是个个挺胸，双双皮鞋发出相碰声。笔者当时看看蒋介石，似乎若无其事，毫无表情。事后才知道是新规定的表示对蒋介石尊敬的礼节。汪精卫也曾来梅花碑对省政府各厅处人员讲话。他说他祖籍原是绍兴人，后来才迁居广东，听者将信将疑，以后常当笑谈。

抗战前一年，在“西安事变”之后，朱家骅当浙江省主席。在梅花碑老衙门里召见四年前他在浙江当民政厅长时举行浙江省第三届县长考试录取的人员。询问：“你们久未外放是何道理？”有人感慨地说：“自古以来就是‘朝内无人莫做官’啊！”不久笔者被派赴浙南云和县当县长，结束了呆在梅花碑七年的历史。

（二）第二次回到梅花碑老衙门只有 10 个月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时云和县是浙江省政府的临时省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集合各厅处的先遣人员 30 多人赴淳安县，再会集浙西行署人员成立所谓省主席行辕。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和省社会处长方春偶担任正副主任，并指定笔者为行辕秘书，先赴杭，于是笔者又到了梅花碑老衙门。第二年 4 月，浙江省政府改组，沈鸿烈来当省主席。笔者将经办职务交代清楚，到上海向黄绍竑报告。这是笔者第二次离开梅花碑的老衙门。以后在浙江省银行特设的“经济研究室”主编《浙江经济》月刊和《浙江经济年鉴》达三年多。自以为可以从此长期埋头做文字工作了，想不到还有第三次再进梅花碑老衙门的“奇事”。

（三）第三次到梅花碑是在 1949 年 5 月 3 日。那天，杭州解放，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原浙江省银行经济研究室所有人员、图书、资料等全部调入由张劲夫领导的“财经委员会”工作，于是再进梅花碑的衙门。笔者急急忙忙地编写《折实公债》与《浙江渔业》两份

资料；接着随财政厅长的世印带着浙江大学一些学生赴嘉兴地区作社会调查。返杭后笔者汇编七位厅长级干部从全省各地带回的资料，供新政府施政参考。后我被调充省人民政府核稿秘书。当时内心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尤其是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来担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的黄绍竑一再来信嘱笔者要“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以赎前愆。”在后来的两年中，工作相当紧张，大多时候要每天晚饭后再去搞两个小时。两年后又进浙江干校五期，学习结业后再进华东革命大学直属班学习，直到1951年4月间“镇反高潮”来临时，才完全结束了笔者第三次进梅花碑老衙门的历史。

回忆杭州沦陷前后

沈国英

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征服世界首先灭亡支那(中国)”的侵略野心,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我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大片土地。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发动战争,1937年7月7日制造“芦沟桥”事件,8月13日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开始了向我国的全面侵略。

杭州市是1937年12月下旬沦陷的。国民党守军12月23日下午3时左右炸断钱江大桥,最后一批守军沿杭富公路撤出杭城。城陷前谣言频传,人心惶恐,人们早闻悉日寇烧杀凶狠,纷纷逃避。当时的英、美、法等国尚未与日军交战,因此英国人办的广济医院(现浙二医院)、法国人办的仁爱医院(现红会医院)、仁济医院(现已无)、教会办的惠兰中学(现杭二中)、基督教青年会、天主堂、灵隐寺等成了没逃出杭城人的“临时难民收容所”。连准备认贼作父的汉奸王五权、谢虎丞、高复生(即高懿臣)等民族败类,当时也躲入广济医院暂避。但一些汉奸已蠢蠢欲动,为日机轰炸放信号,造谣惑众,搞得草木皆兵。

1937年12月24日下午4时左右,日寇以马队、步兵搜索开道,大队人马沿余杭宝塔山脚经留下镇杀奔杭州。兽兵们沿公路以火力作“威力搜索”,打枪开炮以侦察有无国民党守军,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路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还放火和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凶残嚣张,惨极人寰。另有一路寇兵是由乔司、三堡入城的,同样无恶不作。

汉奸们原来准备好好迎接“皇军”，还计划安排寇军住地、粮秣草料。由于守军退得迟，日军又来得快，来不及筹办。及至听说日军已进城，匆忙钻出“难民收容所”，由王五权带领义务消防队残留的人，与谢虎丞、朱少臣等群丑，打着纸糊的日本膏药旗和欢迎标语，前往献媚。

当时进城的寇军有：土桥部队、牛岛部队及山口、伊藤、大久保、山县等部队，日军的特务机关、宪兵队也同时到达。当时正值隆冬，汉奸们又来不及准备，所以就破门入室占住，并卸门砸窗取暖作炊。日寇还藉口搜查“散兵”，由消防队汉奸领先带路，逐家挨户入内搜索。兽兵们见粮食、贵重财物就掠，见年轻男人就杀，见妇女不论年轻或老嫗都强奸或轮奸，整个杭城被洗劫达三、四日之久。被兽兵轮奸致死，或奸后用刺刀戳阴部至死的甚多。整个杭城凄凉、阴森、恐怖，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日寇野战军人城后在各城门。通道及市内各十字路口设岗哨关卡。当时杭州有钱塘、涌金、艮山、凤山、清泰（即草桥门），望江、武林、太平、候潮、清波十城门；有的虽已无城门，但残留城墙或墙垣还在。日寇就在城门口及路口堆砂袋、拉架铁丝网路障或构筑碉堡，搜查盘问行人。

进城第二天，日本特务机关长次尾、宪兵队长若松茂平、藤田、吉田、军隅本和拱宸桥日本领事馆领事松村，率日本宪兵队翻译来庆忠、沈定富、沈福林及日本部队翻译朱连宝、领事馆翻译董锡令一起，召集汉奸高复生、王五权、谢虎丞等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由高复生任干事长、谢虎丞任副干事长，程他山、孙少川、张子瑜、韩雨文、邓孝可为干事，另有秘书长徐曙岑、秘书陆迪中、孙补山。总务科长高尔和、警卫科长陈鼎文、财政科长汪宣传、建设科长胡予、宣传科长程季英、征集科长王五权、救济科长邵力更、保安股长范颂西、司法股长汤应煌、卫生股长沈一沧等。在各区设下属组

织,成立警察署等,颁发“良民证”,协助日寇维持统治。自此汉奸为虎作伥,趁火打劫,趁机横敛财物。

当时的“良民证”有三种。一种是用长三寸左右、宽四寸多的白布条,上面墨写“良民证”三字,盖上维持会红印泥方章;第二种也是用布条,但盖的是日本宪兵队的“日宪”元红印泥章,这种良民证是汉奸和有权势的人才有条件佩的;第三种是盖上“日宪”印后又加盖“特务机关”印的良民证,这种良民证是专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爪牙用的。只有胸前挂着“良民证”的人,日本“皇军”才认你是“顺民”,免被立即“格杀勿论”。

凡是要通过日寇哨卡的,必须胸前佩带“良民证”,在距兽兵十多米前站立端正,然后要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还得听兽兵吆喝去或退,稍一不慎,就会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枪托击打或放狼狗扑咬,严重的会被抓或当场枪击刀刺格杀。通过的人要被搜身盘问,有的日本鬼子为了取乐,会叫人跪在铁丝网前当狗爬。女的尤为遭殃,不但遭受百盘侮辱,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拖入哨所,被强奸或轮奸。人们把哨卡叫“鬼门关”,有的人一去不复回,家属探听还要被灭门。有时日本侵略兵酗酒横冲直撞,窜人民宅索要“花姑娘”。大塔儿巷 11 号,两日军官争奸一女拔枪斗殴,女被迫自杀。汉奸们为了讨好主子,除把泗水坊全部划作“慰安所”,由日军妓供兽兵玩弄外,又在新泰第二旅馆、金城饭店等处设“军妓院”,诱骗和强迫因生活困苦或“招工”诱骗的同胞姊妹,作军妓供兽兵发泄兽欲。世界闻名的天堂,竟成了人间地狱。

杭州沦陷第四天起,汉奸们为讨好日寇,便强令红卍字会和普济堂、同善堂等慈善机构掩埋尸体,当时被日寇杀戮致死的男女、老幼尸体很多,足足埋了近两个月才大致埋完。汉奸还强令商店开业,先命高长兴、协顺兴、聚来园等饮食业开业,又令大世界新市场等商店开业。伪“新浙江报”1938 年 1 月 1 日起出刊,渲染“东

亚共荣”“中日提携”，吹捧皇军”战功，诬蔑抗日军民是“残匪”、“暴徒”，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杭州新报”、“商报”等亦相继出刊。

杭州沦陷时，我仅16岁，到泗乡里桐坞舅父家避难。一天下午，听到人们奔跑叫嚷：“日本兵来了。”大家纷纷避入屋内。我小舅父刚逃到家门口，被追上的日本兵对胸一刺刀，倒下，血不断涌染着衣衫。一个兽兵冲进屋，对楼上开了一枪。很多人，包括大舅父及邻居等都跪了下来。我仍呆站着，我穿的是芝麻布学生装，兽兵指我叫嚷“支那兵”，把马刀搁在我颈上。可能我年龄太小，或是野兽还不想杀我，把邻居跪地上的一妇女怀抱中的婴儿塞给我抱，拖着妇女去强奸了。大约二个多小时后，枪声稀少，兽兵们逼着抓到的村民，抬着被枪射死的猪、鸡走了。不少被点着火的房子正在燃烧，大家怕野兽再来不敢去救，直到天黑才去扑火。事后知道这次日本兵到村里杀死7人，烧毁房屋9间。

杭州沦陷后，一部分守军撤到钱江南岸，在萧山西兴沿江设防。钱江大桥中段已炸断，南堍也堆筑了沙袋和工事用作防守。另一部分退入富阳、临安、建德、桐庐等地的军队，凭藉险要地形和高山据守。当时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即中央军外，还有地方部队、保安部队、省抗敌自卫总司令部所属各游击支队和县自卫队，浙江省会警察局已改编为第一支队，司令赵龙文。军统、中统，还有其他杂牌游击队数目繁多，但都属第三战区，名义上属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这些部队离杭州很近，另外地形熟，所以不断袭击敌人，使兽兵无法安宁。加上当时在浙西的中统毛森是“蓝衣社”的别动队长，下有“行动组”，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包括驻在富阳里山、大源一带的赵龙文部队，亦都有便衣行动人员，经常潜入杭州市区，狙击汉奸和单行的日兵。日寇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在四郊农村山地出兵，对游击队扫荡，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恶不作。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加上市内成立“维持会”后不久又成立

了治安会，返回市区比躲在郊区要稍“安全”，所以暂时逃躲在乡下的难民，开始纷纷逃回市区。我是独子，大舅父怕出问题无法向我妈交待，也为减轻他的负担，所以在杭州沦陷后的第五天，给了我四块银元，和村里走“老道”的人一同回到了上天竺“难民所”。所旁就是维持会，我交付了一块银元买了一块“良民证”挂在襟上，沿着石阶先到灵隐，然后沿着西湖进钱塘门，再往迎紫路（现解放路官巷口至湖滨段）、中正路（现解放街东段）、葵巷回家。一路上行人稀少得使人发慌，远处兽兵吆喝声使人胆颤心惊。我恍恍惚惚，也记不起过了几个哨卡、鞠了几次躬、挨了几句日本话的骂和几次踢打才到了家。家中堂前堆满了马粪、鸡毛、吃过倒掉的残菜剩饭，还有烤过火的灰烬。室内家俱已无，箱已砸破，未被劫走的破东西散满地上。没有邻居，我孤单一人啃着临走时大舅父给的冷饼。人夜把碎布往身上堆，蜷缩在墙角，又冷又怕，颤抖着无法合眼。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去找同学吴连根，他爸吴文喜是“聚丰园菜馆”股东老板，是商界大贾。菜馆大股东兼经理霍继昌，与王五权等大汉奸在商界上有渊源，在王五权等压力下开业，当时也正需要人。一谈吴文喜同意留我在聚丰园做杂工，即拖扫地板，擦抹桌椅等杂工，言定没有工钱，吃“回崽儿”（即顾客吃剩的残羹，分半股“小帐”（即顾客赏赐的小费）。

日寇为了巩固和强化对杭州的统治，占领杭州的第二年，在原中央银行唆使汉奸成立“浙江省自治委员会”。日酋松井石根为委员长，肖滌尘、谢虎丞为正副主任，并委任王五权为社会科长兼征集科长，文达成为庶务科长，汪加生为财务科长，邵力生为救济科长，程秀美为宣传科长，陈鼎文（即陈秉钧）为警察局长，高尔富为特务机关总务科长，胡预为建设科长。他们网罗爪牙，开设“警士训练班”，培训汉奸势力，建立特务组织。并找来恒大米店老板韩雨文和徐行恭，逼其由乡间运米入城，供应兽兵、汉奸与居民。

侵杭日军部队长是松井石根。土桥部队驻在膺白路(即现南山路)一带;敦仁街一带由牛岛部队占住;城站一带由山口部队驻扎;宪兵队驻在原东南日报馆址;特务机关设在圣塘路九芝小筑,并在民生路46号(即现省武警总队处)设立以汉奸石林森为主的“侦缉队”(实际上由日本特务机关掌握),李宝和、包瑞正、陈春辉、金德春是当时闻名全城“吃人不吐骨头”的“四大金刚”。还有便衣密探孙宝龙、方阿有,以及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便衣队中被日寇捕去投敌的叛徒密探。

日本宪兵队占驻原东南日报馆后,在其周围竹竿巷、法院路(现青春路)、浣纱路、岳王路、众安桥处设置铁丝网路障,派兵把守,门口筑有碉堡,阴森可怖。日本宪兵队表面上是维护部队军风纪,处理不忠于天皇的官兵和督战及维护兽兵士气,但主要还是抓审反日抗战志士,尤其是抓捕共产党人,破坏我地下秘密组织。当时日军部队、警备部队、“46号”和汉奸警务组织等抓的重要嫌疑人犯,都要送宪兵队。宪兵队里有很多刑具,抓进去的人首先一顿很重的拳打足踢,煞煞“下马威”,造成你心理恐惧,然后灌自来水、辣椒水,或皮鞭抽打、拔指甲、火焰,还有军犬扑咬,这些狼狗经过训练,专门听命扑咬人,异常凶恶。之江大学教务处职工殷太盛因有抗日“嫌疑”,被狼狗活活咬死。认为嫌疑又审不出来,或已半死无法再审时,往往被手枪击死在刑场上。宪兵队的卡车经常往外运尸体。在杭州沦陷至1939年4月这段时间中,据说已有1500多人被抓进宪兵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免于死。即使是活着出来的人,也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走狗中最坏的是米庆忠,这是个死心塌地希望“皇军”“武运长久”、永远骑在同胞头上作威作福的汉奸。有的因没有对他孝敬(送礼)或孝敬太少,有的他认为对他顶撞,就被打死了。沈福林是去过日本学裁缝的手艺人,抗战前回国,杭州沦陷时被发现后叫到宪兵队当翻译,只要对他送礼走门